

意大利“聖家書院”研究

劉 芳*

清初著名傳教士馬國賢神父在中國宮廷工作長達十三年之久，後來返回歐洲，在意大利創建了一座專用培養中國神職人員的宗教機構，史稱“聖家書院”，又名中國書院。此書院歷時一百來年，共培養了一百多名中國神父，其中一半左右的傳教士在湖廣地區工作。仔細研究該書院的建立過程及學生的活動情況，梳理出其對中國天主教，尤其是對湖廣地區天主教傳播與發展的作用，對早期中外交流與天主教在中國本土化的進程也具有一定意義。

前 言

在意大利靠近桑尼塔橋西北方的一個社區內，有一座中國書院，是羅馬傳信部培養年輕中國傳教士的宗教機構。這就是18世紀意大利人馬國賢神父創辦的“聖家書院”（Sacra Famiglia di Gesù Cristo）。⁽¹⁾

馬國賢（Matteo Ripa）1710年來華，在華十三年，歷康熙、雍正兩朝，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²⁾萬明教授曾撰有〈意大利馬國賢與中國學院研究在中國〉⁽³⁾一文，對相關研究作了總結概述。當前學術界仍多關注馬氏在華活動及在藝術方面的貢獻，而對聖家書院僅在論述近代中國教會大學及意大利漢學時才有提及，而鮮有人涉及聖家書院中國神職人員研究；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忽視了他們的工作，在禁教後，他們對天主教在中國的維持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沒有他們的存在，很多教徒都會放棄信仰。⁽⁴⁾漢中主教 Lorenzo Balconi 亦對這批中國神職人員大加贊賞，認為在 Nathaniel Burger 主教被放逐至澳門時期，納玻里中國書院的神父是唯一在此工作的人。⁽⁵⁾本文詳細整理、統計聖家書院學生資訊，

對書院培養的學生傳教活動作詳細分析，以期重現這一時期的歷史，對他們在中國天主教史的作用給出一個適當的評價。

馬國賢“在華十三年”

馬國賢1682年生於意大利薩來諾教區的愛波利（Eboli）。⁽⁶⁾其十八歲時因偶遇一位方濟各會士演說而備受鼓舞，立志從事傳教事業：“西元1700年，我18歲，正是風華正茂，幸福高興的青春時光。這一年我從萬能的天主那裡收到了從事這一神聖事業的第一個推動力。”⁽⁷⁾當時他加入意大利本土一個鮮有名氣的修會——虔勞會，但是很快就表現其懷才不遇：“儘管我曾經對那個修會有過最強烈的崇拜之情，但現在卻感到了哀傷和沮喪，甚至不能繼續前行。”⁽⁸⁾正當馬國賢躊躇時，他得到一個與中國結緣的機會：時值羅馬教宗 Clement XI 為培養中國傳教人材在傳信部建立羅馬書院，“讓前來中國傳教的歐洲傳教士在那裡學習科學和漢語，以便把福音帶到為異教所蒙蔽的中國人之中”⁽⁹⁾。馬國賢在其指導者托勒斯神父幫助下入院，成為“書院裡最早的兩名學生之一”⁽¹⁰⁾。此後他又兼任羅馬教師書院

* 劉芳，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輯；研究方向為中西文化交流史。

院長一職，此番經歷為其日後傳教於中國及創辦學院亦打下基礎。

馬國賢來華正值“禮儀之爭”白熱化，天主教會因為一場前所未有的爭論而面臨分裂。馬國賢正是在天主教傳教的困難時期來到中國，他的命運注定要和18世紀初中國天主教會內外的是是非非聯繫在一起。⁽¹¹⁾時教宗特使鐸羅主教最初受到康熙帝熱情款待，教廷對中國傳教充滿信心，決定嘉獎鐸羅，加派傳教士，於是馬國賢受命東來。1708年馬國賢一行抵達倫敦，在公使西格諾·考那羅的幫助下，直接到英國東印度公司要求乘船去中國。⁽¹²⁾來華後馬國賢以繪畫才能而得康熙賞識，但是宮中生活與其格格不入，尤其是他反對中國禮儀更是讓他在宮中險象環生。雍正登基後，馬國賢決意回去歐洲。

聖家書院的建立

馬國賢對傳教事業充滿熱情。但是他對傳教成績持有自己的看法，認為不能祇看教徒數量，品質才是關鍵。正是基於此認識，其來華後並不急於發展教徒。在他看來，確切理解教義是成為天主教徒的首要條件。這從1711年馬國賢在九江一個客棧住宿時拒絕為旅館主人及其子受洗中可以看出。當時兩人在神父啟發下對天主教產生興趣，萌生入教念頭，但是神父認為短時間的認識不足以入教，拒絕他們，留給他們一本教義書，令其充分瞭解，堅貞信念之後才接受他們。馬國賢堅持保證品質是因為他曾經過印度，看到葡萄牙國王急於維持和擴張天主教而濫收傳教士，馬國賢對他們評價極低，認為這些人不僅對聖教毫無益處，反而“使我們神聖宗教丟盡了臉”。⁽¹³⁾

當時在華之歐洲傳教士亦深感中國“羊群甚多，而牧者甚少”，在中國創辦修院培養神職人員一直是羅馬及歐洲傳教士的希望。清初魯日滿神父傳教江南時，曾與傳道員何世貞在常熟“組織善會，逐步地培養其中的成員成為傳道員和講道員”⁽¹⁴⁾。1699年畢天祥神父來華也擔負着羅馬

教廷這樣的願望。⁽¹⁵⁾法國傳教士亦覺得有訓練本地教師之必要，且認為“在中國頗難使一司鐸必具之拉丁文及其他科學等學識有所深造”⁽¹⁶⁾，所以打算將中國學子派到西方學習。馬國賢神父也直言：“我很清楚這個遼闊的國度是多麼地缺乏人手，而歐洲又不能提供。從1580年至1724年，歐洲送到這裡來的傳教士數量不足五百人。”⁽¹⁷⁾另外語言障礙也使傳教事業事倍功半：“無論歐洲傳教士是多麼熱情，但因為語言上難以克服的障礙，不能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¹⁸⁾所以馬國賢明白培養本地神職人員的緊迫：“我堅定地相信在天主的教會裡，應該責無旁貸地建立一個宗教團體，專門的目的就是使本地人有能力來行使傳教使命。”⁽¹⁹⁾馬國賢的願望得到很多歐洲人的支持，他們給他寄來了錢財作為資助，但是很快他發現：“我的努力受到亞洲人和歐洲人的共同反對，這種敵意很快讓我覺得天主顯示的是別的意思，並且中國並不是我想要建立一所成功而繁榮的學校的地方。”⁽²⁰⁾最後馬國賢決定回那不勒斯創辦學院。《西遊筆略》中曾記載：“康熙年間有馬公瑪竇者，意大里亞人也，泛海三年，始至中國。後敷教北京，以丹青天文馳名，(……)及聖祖崩，馬公請歸，上問其所慾，對曰：‘願得英才而教育之。’上忻然允諾。”⁽²¹⁾

1732年7月25日，馬國賢回到那不勒斯，“乃以立書院之事請命於王，王許之，爰建高館於城內，名聖家書院，亦名中國學館”⁽²²⁾。他從中國帶出來五個中國人，一個三十多歲的年長信徒，負責照看四個孩子。

選擇在那不勒斯而非羅馬建立書院是馬國賢極力爭取的結果。時傳信部主任和幾個樞機主教都堅決反對在那不勒斯建立書院，理由是不允許“建一座神壇來反對另一座神壇”⁽²³⁾，而羅馬也急於在自己的書院裡招幾個中國人，馬國賢神父害怕他們將自己從中國辛苦帶來的學生搶走。最後他得到教宗本篤十三的同意，將他推薦給那不勒斯的紅衣主教及政府。學院入學權力屬於那不勒斯行政當局，但是傳信部聲稱要擁有將

來學校教授任命之前的考試權。最後在1732年幾方達成統一：

這個新的機構由一個書院和一個教團組成。書院由年輕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組成，用學校的錢款作花費，培養他們成為合格的職業傳教士。教團則是由教士們組成，願意給書院學生提供必要的指導，沒有任何金錢上的報酬。書院學生要做五次發願：第一，安貧；第二，服從尊長；第三，加入聖會；第四，參加東方教會，聽從傳信部的調遣；第五，畢生為羅馬天主教會服務，不進入任何其它社群。教團成員不必發願，但是除了參加書院學生的教育外，還要和團體住在一起，履行屬於本機構教會的職責。⁽²⁴⁾

於是馬國賢克服重重困難，書院終於得以在1732年7月25日開張。

聖家書院的學生

在書院中國學生一般要花上十年學習神學等知識，畢業時通過考試，成績合格者授予神父之品，派遣至中國傳教。1891年出使意大利的薛福成有記：聖家書院“所招中國學生，專以習天主教為本業，其於格致星算之學，不過兼涉”⁽²⁵⁾。這些經過系統神學訓練的中國神父在中國發揮了巨大作用。張澤神父曾高度評價聖家書院：“培養中國本地神職人員，實在是一種目光遠大的宏偉目標，當教難危急之時，扶持教友信德，維持教統之不墜，中國神父之力居多。”⁽²⁶⁾法國學者孟德斯鳩也認為培養本地神職人員是“能使在中國傳教獲得成功唯一可行的方式”⁽²⁷⁾。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李安德神父也極力支持培養中國本土傳教士這個計劃。⁽²⁸⁾

書院自創辦起到1868年12月27日為意大利政府所沒收，歷經一百三十六年，共培養中國學生一百零六名。⁽²⁹⁾這批中國神父由於其出色的傳

教表現，以至於在其去世一個世紀後，教徒仍對他們記憶猶新。宜昌主教古貝爾曾對其作了如下評價：

這些本地神父的出現和他們的傳教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特別是我們考慮到當時的環境。首先，是他們深入中國腹地，照料和巡視那些新的傳教點。它們是在18世紀由於禁教而在湖廣西南部的山區建立的。第二，是他們在1760年後在半個世紀裡接替了四川傳教士在湖廣的工作，照料起沙市、Heng-ti-shih 和常德等地的教徒。第三，也是他們維持和擴大了葡萄牙耶穌會的成果。他們繼承了葡萄牙耶穌會在整個湖南和湖北的大部分工作（武昌、德安等地）。湖廣被託付給陝晉代牧兼管後，代牧僅能用書信指導和安慰納玻里書院的神父。但是他們自耶穌會解散後（1775）到湖廣從陝晉代牧兼管中獨立出來（1838），在長達六十三年時間裡，他們對於湖廣天主教事業的延續有着不容小視的作用。⁽³⁰⁾

本文收集了大量中西文材料，詳細統計出一百零六名學生的資訊：西文名、中文名、出國時間、晉鐸時間、回國時間、傳教地區及去世地點。由於篇幅原因，在此刪減了全表，僅以統計說明，學生主要來自以下幾個省區：湖廣二十三名，河北七名，江蘇十一名，四川五名，廣東二十一名，陝西八名，福建五名，山西十五名，甘肅五名，北平一名，河南三名，南京一名，其他未詳者一名，菲律賓籍一名。⁽³¹⁾湖廣最多，佔有五分之一。洪勳所撰《遊歷聞見錄》有記：

院在那波利城中山坡上，（……）嗣後華人輒有往者，大率湖北人。（……）今遊院中，見學徒弱冠者六七人，叩其籍貫，皆楚產也。（……）昨觀羅馬教王宮術奇會，有壽文二篇，置樓上玻璃匣內，皆華文小楷：一係某教堂公具，一署尾曰：“弟子湖北省某府縣廩生

某上教王壽表”，字樣僭越，稱謂奇異，可知楚人之信彼教，必由阿其所好者。⁽³²⁾

神父主要來自於湖廣西北部等偏遠地區。這是與當時的傳教形勢相合的。禁教時期，天主教從一線城市縮退到山區偏遠不易被官府干擾的地區。這一時期湖北西北部、西南部成為傳教較繁榮地區。教徒形成教友村，世代相襲。神父多出身於基督教家庭。如趙西滿，其父母雙方都是基督徒。榮振華也記載道：1741年，Barnabe Chang 出生於襄陽這個老基督教社區，他是未來聖家書院的神父。⁽³³⁾ 此外劉開迪神父也是來自基督教徒家庭：“小的是沅江縣人，(……)由祖父相傳下來俱習天主教。”⁽³⁴⁾

湖廣為聖家書院提供了二十三名學生，但是卻收穫了四十多名傳教士。⁽³⁵⁾ 柯毅霖博士統計：一百零六名中國學生中，大約有九十名成為神父，其中約八十名返回中國傳教。⁽³⁶⁾ 這批中國神職人員大部分工作於兩個代牧區，即四十五名在陝晉代牧區，而約四十名在湖廣代牧區。湖廣成為聖家書院學生進入中國內地重要教區。我們先來看看這些傑出工作者在湖廣的成績。

一、谷文耀與殷若望

殷若望1734年抵達湖南，是第一位來自聖家書院的神父。他是馬國賢最初的幾名學生之一，馬曾稱贊他“口德高尚、虔誠而又溫順”⁽³⁷⁾。1734年他與谷文耀晉鐸後返回中國，在澳門受到傳信部賬房 Miralta 神父極大歡迎。傳信部在澳門賬房的職責是在與各代牧協商後，根據教區需要將新到達的神職人員分派至各教區。⁽³⁸⁾ Miralta 神父擬將二人分配到四川，受穆天尺主教的領導。⁽³⁹⁾ 但是殷若望不幸於湖南湘潭去世。谷文耀則繼續前行，雍正十三年到達四川合州，此後他一直在國內傳教。⁽⁴⁰⁾ 穆天尺曾記載他在四川時曾接受過五、六名中國神父，這些神父有一些是那不勒斯聖家書院培養的。⁽⁴¹⁾

二、趙西滿與趙多明尼克

谷文耀與殷若望兩位是最早從聖家書院到湖

廣的神父。但是他們並沒有傳教於湖廣。第一位來自聖家書院傳教於湖廣的神父是趙西滿。方豪先生書云：

乾隆十五年三月，那不勒斯有中國青年學生八人卒業。時教宗方以中國教會之衰落及西洋教士不能自由傳教為殷憂，乃召八人至羅馬，委樞機主教四人加以甄試。試畢，教宗大為褒獎，並在教廷全體人員前，對那不勒斯書院盛加稱譽。其後，即有郭元性、趙多明、趙西滿、蔡文安等四人回國工作。⁽⁴²⁾

趙西滿1722年生於湖北荊州，其父母均是基督徒。時有記載在湖廣曹家場和楊家場曾有趙姓、雷姓、孔姓和文姓基督教家庭。後來由於其地貧瘠，被迫移民到其它地區。⁽⁴³⁾ 他先在四川修道院學習，後被派至意大利。趙西滿於1747年晉陞神父，1751年到達中國後在湖廣度過了一生。Ko 神父在統計中曾記載趙西滿神父在四川傳教，但這是一個謬誤。谷文耀神父是當時唯一來自聖家書院而被派至四川傳教的神父。因為四川是劃分給巴黎外方傳教會修會獨管的區域，所以傳信部盡量避開四川。趙神父主要管理 Chang yang 和巴東山區。他最後於1778年6月8日死於細沙河的一座山上。趙多明尼克(Dominique Tchao)，出生於四川成都，與趙西滿同時被派到聖家書院，又同時晉鐸回到中國。趙多明尼克傳教於湖南，於1754年8月18日在常德去世。⁽⁴⁴⁾

三、蔡多伯祿、劉凱弟和何神父

1767年蔡多伯祿來到湖廣。蔡神父是乾隆時期最著名的中國神父之一，但是以往均認為他祇是教友，而非神父。從聖家書院的外文材料中，我們可以查明蔡多伯祿在聖家書院畢業後被授予以神品：蔡多伯祿1736年出生於福建龍溪，1761年被派至那不勒斯的聖家書院，六年後即1767年陞為神父。⁽⁴⁵⁾ 方豪先生認為蔡多伯祿祇是普通教徒是有其原因的。因為一般學生在那不勒斯要經過十年學習才可以通過考試晉鐸為神父，但是蔡

多伯祿卻祇學習了六年。如果不是幾份西文材料中明確指出1767蔡多伯祿晉鐸後派遣回國⁽⁴⁶⁾，我們確實對他的神父身份有所懷疑。同年他返回中國傳教於湖廣、福建等地區，且與多明我會在福安穆陽等地的教徒、神職人員有所接觸，可見蔡神父一直在國內的傳教網路中起着聯繫人的作用，很快蔡多伯祿名聲大振，因為他是乾隆四十九年大教案的重要人物之一。

當時澳門主教於乾隆四十九年先後派出三批傳教士潛入內地。最後第三批傳教士潛入時被官方拏獲。據湖廣總督特成額奏報：

七月十二日據鄖陽鎮右營守備舒萬年稟稱，其巡查水汛至白家灣，起獲四名往陝西傳教的西方傳教士，並查點舡上箱物，內箱一口，俱裝西洋經卷，並紙畫神像等物，還在小木箱內見有蔡伯多祿寄與李姓書一封。⁽⁴⁷⁾信中是廣東羅瑪當家發四名傳教士往陝傳教，令蔡伯多祿送至湖南湘潭暫住，另着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託李姓送往之語。⁽⁴⁸⁾

乾隆對此事件極為重視，尤其是對中國人蔡多伯祿更是惱火，要求各級官員速將其逮捕歸案：

蔡伯多祿（……）係此案要犯，何以至今未獲，該犯素與夷人熟識，見緝獲緊急，自必仍逃往廣東，或竟在澳門藏匿。（……）飭屬嚴密設法緝獲，解京審辦，毋得日久疏懈，致令遠揚。⁽⁴⁹⁾

然而蔡神父卻在澳門保護下，逃難果阿⁽⁵⁰⁾，此後終身沒有返回內地。蔡神父還留有幾封拉丁文書寫的信件。

在教案發生之時，共有十四名來自納玻里中國書院的神父在各地工作。教案波及七名神父被捕流放。其中劉凱弟神父（中文檔案中曾為劉開迪）在湖廣被捕：

劉凱弟（Philippe Lieou），1752年出生於湖南沅江，十八歲時入納玻里書院學習，1774年晉鐸。同年他來到中國，被派往湖南湘潭傳教。⁽⁵¹⁾

據劉開迪供稱：

小的是沅江縣人，劉開寅、劉開達俱是胞兄，由祖父相傳下來俱習天主教。小的從十五歲就往廣東生理，來往澳門，還到過西洋呂宋國，所以會說西洋話，能寫西洋字，就是家裡起出的十字架、洋漢字經本都是呂宋國買來。⁽⁵²⁾

最後劉開迪等人被發配伊犁。雖然從其口供中，劉神父否認自己是神職人員，且對自己曾留學海外也三緘其口，但是從多方材料我們仍可肯定其與西文中納玻里學院的劉凱弟神父為同一人，口供的出入當應是為了使官府不至懷疑而引發更大的教難而有所隱瞞。

蔡神父正是將接引四名傳教士進入內地的任務託付給劉神父，但是沒想到這場逮捕引起了全國性的教難。劉神父後被押解至北京後判流放伊犁。

大教難使湖廣傳教面臨危險，然而這並沒有阻擋住聖家書院的中國神父回國傳教的熱情。就在大教難發生的同年，又一位何神父（Nicolas Ho）到達湖廣。何神父1759年生於四川，1773年被派到那不勒斯學習，1784年晉鐸，1785年10月29日回國。他一直在湖廣傳教，直到1827年7月2日去世，在湖廣傳教工作長達四十二年之久。⁽⁵³⁾其主要傳教地是湖北西南部山區，如細沙河、彈子山等地。1790年他從武昌起程去廣東迎接遣使會士阿本神父。其妹即著名的貞女何亞達（Agatha）也跟隨他來到湖廣。何貞女在1840年董文學神父被捕時受牽連入獄受盡折磨，最後死於流放地。⁽⁵⁴⁾1816年何神父從湖南長沙將藍月旺神父的遺體運回廣東，此後仍秘密返回湖廣進行工作。

四、田廣益 (François Tien) 神父

田廣益出生於山西，1839年回國後傳教於湖廣，最後死於湖南衡州。⁽⁵⁵⁾ 1845年李文秀巡視湖廣時曾提起他與另一位傳教士 Irtelli 管理 Hetan-kow 地區。後來他們在房縣被捕，被指控為當地基督徒的首領。房縣縣令要求他們從十字架上踐踏過去以示棄教，但是他勇敢的回答：“還不如讓我去死！”⁽⁵⁶⁾ 李文秀主教亦記載了其在監獄中備受折磨：

官吏經常傳呼神父到庭來折磨他。有一天官員極其野蠻地對待神父，將他的雙手綁成十字架的樣子，然後將神父用頭髮吊在房樑上。還有一次，官員將神父的膝蓋捆綁得像個折疊的方塊，然後在外面蓋一塊鹽布來惡化他的傷口。這樣的酷刑從太陽升起一直持續到半夜，長達六天。每當神父支持不住倒下時，官吏就派人將神父折騰醒，然後讓他再這樣跪着。⁽⁵⁷⁾

儘管在監獄中受盡折磨，但是田神父仍然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在他入獄十個月之後，他被遣送至其出生地。此後他又重回湖廣傳教。田神父最後於1885年去世。⁽⁵⁸⁾

在1870年後，還有大批中國神父傳教於湖廣，由於篇幅所限在此無法一一作出說明。

聖家書院對湖廣天主教的影響

聖家書院的學生無論從籍貫還是從傳教地來看湖廣都是位於前列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以下幾方面造成的：

第一，從表中統計得出這些出生於湖廣地區的學生主要來源於天門、襄陽、湘潭、鄖西、沔陽等，這些均是湖廣較為重要的基督教地區。如湘潭，早在清初穆迪我神父傳教於湖廣時，就在湘潭開闢了傳教點。此後據西方學者榮振華統計，在聶若望神父時期，湘潭地區“計算有

二千基督徒，六座教堂，每年有二百九十次洗禮。”⁽⁵⁹⁾ 這一地區的基督教傳統也較湖廣其它地區長久而持續。洪勳亦提及：“可知楚人之信彼教必由阿其所好者。”⁽⁶⁰⁾

第二，襄陽、鄖西等地是湖北西北部及西南部偏僻山區。鄖西曾經一度是法國耶穌會士長時間內唯一未涉足的地區。因為這裡地理環境惡劣。但是自禁教後情況發生逆轉，湖北西北、西南成為當時兩個傳教中心。從磨盤山基督教社區的建立中就可知一二。雍正禁教令“是令教會在清朝前期再也沒能恢復元氣的重重一擊”⁽⁶¹⁾。教徒們被迫“在兩日內行走到老河口西部，在穀城山中建立了著名的茶園溝天主教社區，它被稱之為聖心的殖民地”⁽⁶²⁾。“襄陽教區的領袖們避開官員們的嚴密搜查，決定逃到這個大省的北部，離古鎮七法里的山區裡去。”⁽⁶³⁾這裡“適當穀城房縣保康三縣界部，行旅既難”⁽⁶⁴⁾房縣“其境萬山巖峽，林壑遂深，知為幽遠險僻之區”。⁽⁶⁵⁾對躲避官府的迫害極為有利，這個社區在百年禁教時期一直是湖北天主教發展的重心。特別是耶穌會解散後，遣使會士幾乎無一例外均以穀城磨盤山為主要居住地，對當地基督教社區的延續及發展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因為如此，他們才有可能培養出年輕人前往聖家書院進修學習。

同時由於湖廣處於遣使會的管理下，遣使會又以培養本地神職人員為首要任務，因此他們對當地年輕人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視的。我們從法國遣使會在北京設立的修院中湖廣籍貫的學生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就可明白。⁽⁶⁶⁾

傳教於湖廣長達二十七年之久的遣使會士劉克萊神父，也非常重視培養本地神職人員。他挑選出品性良好的兒童學習拉丁文，以為將來進入修道院作準備。⁽⁶⁷⁾劉克萊神父還“規定兒童自七歲後至十七或十八歲止，均當一律赴考（考試天主教教義）”⁽⁶⁸⁾。這些行為無一例外均是為了培養年輕神職人員。1804年劉克萊神父就曾將自己學校裡的三名優秀學生送往北京遣使會修道院。⁽⁶⁹⁾正是湖廣這種一直致力於本地神職人員的培養，

所以才會有大量聖家書院的學生出身於此，這是與當地濃厚的宗教氛圍分不開的。

湖廣成為聖家書院的學生來華傳教的重點選擇對象則是以下幾方面造成：

第一，由於大批學生均出身湖廣，他們學成回國時回到自己家鄉傳教無疑是最合情理的。由統計我們也可以看到，大部分出身於湖廣的學生神父最後傳教地仍是湖廣。⁽⁷⁰⁾

第二，對於那些非湖廣籍貫的學生神父而言，為甚麼湖廣也是他們傳教首選？因為首先，當時湖廣山區的基督教社區由於地理環境等多方面因素，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區。這裡宗教氣氛濃厚，形成單一的宗教社區，沒有外教人員，在禁教的汪洋大海中猶如一處世外桃源，因此吸引神父前往傳教是理所當然。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一地區教徒人數眾多，急需大量傳教士來此服務。當時劉克萊神父初至中國，曾傳教江西一年，後被羅廣祥神父召至湖廣，因為湖廣教區“比江西更需要傳教士”⁽⁷¹⁾。“湖北教友，較他省獨多，惟皆處深山之中，如上津之田家溝，鄖西之黑炭溝，房縣之高橋溝，棗陽之東山北山，穀城之黃山姬、栗子坪、磨子崖、茶園溝等處是也。而其中尤以茶園溝教友為數最多。據真福遺書所雲，約有二千。”⁽⁷²⁾薛福成遊歷時曾與聖家書院教師、曾經的書院學生郭棟臣交談，在其回憶錄中亦留下以下字句：“余問中國人入天主教共有幾何，據稱共有五十萬人，江蘇、四川兩省最多，各有十萬左右。湖北一省，約有二萬三千人。蓋自雍正年間驅禁以後，咸豐十年與各國立約，復許傳教，迄今僅三十年，所以止有此數也。”⁽⁷³⁾同時我們還應該考慮到1819年傳信部同意調換傳教轄區：河北南部和山東西部歸入北京教區，而從前隸屬耶穌會管轄的湖廣省則轉為傳信部轄區。⁽⁷⁴⁾意大利聖家書院的中國神父是直屬於羅馬傳信部所管轄的，所以將他們派至其單獨的管轄區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1841年李文秀主教巡視湖廣天門等地時，就提及這裡大約有一千八百名基督徒，上百個基督教社區，在六名傳教士的指導下，而這六名傳

教士中有五名是來自意大利羅馬的納玻里書院的中國學生。⁽⁷⁵⁾

意大利宗教界對培養中國學生前去中國傳教寄予了極大希望，《那不勒斯公報》說：

根據從中國得到的最新說法，我們知道中國皇帝不斷提高反對聖教的嚴厲程度，下令驅逐了三十五個歐洲傳教士，把他們流放到廣州後還不满意。他還下達最嚴格的命令，搜查了剩餘幾個在北京躲藏起來的留守人員。我們還得知，已經有兩個傳教士被捉住。我們滿意地獲悉：就在天主的葡萄園——中國傳教領域內神工們被剝奪的關鍵時刻，我們新辦書院裡的兩個中國學生已經作為傳教使徒開赴中國去了。因為是中國人，他們不是這麼容易就被捉住。我們可以指望他們在為當地同胞的良善與福祉等廣大方面取得成功。⁽⁷⁶⁾

總之，馬國賢所創辦的聖家書院不僅招收了大量湖廣籍學生，培養他們成為神父，更重要的是它為湖廣提供了大量傳教士。這些中國神父，不僅在接引傳教士進入教區，協助神父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自身對湖廣整個天主教的發展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正是得益於他們，天主教才在百年禁教時期禁而不絕。這正如西方學者所指出的：“在整個禁教時期，當歐洲神父無法守護住其職責時，正是本地神職人員和那些傳道員，拯救了整個形勢，他們為了使信仰維持不斷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⁷⁷⁾

【註】

- (1) 這所學院即現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之前身，見楊慧林：〈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及其漢學研究〉，載《世界漢學》創刊號，1998年。
- (2) 郭永亮：〈拿不勒中國書院創辦人馬國賢在華史簡介〉，載大陸雜誌社編委會編：《哲學·宗教·神話》，臺北：大陸雜誌社，1975年，頁484。
- (3)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Napoli, 2006.

- (4)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p. 200-201.
- (5) Gianni Criveller, *The Chinese Priests of the College for the Chinese in Naple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Indigenous Clergy (XVIII-XIX Centuries)*, 未刊稿。
- (6)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海：光啟出版社，2003年，頁477。
- (7) Matteo Ripa,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Parte Prima*, Napoli, 1832, pp. 8-9.
- (8)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 14.
- (9) Matteo Ripa,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Parte Prima*, Napoli, 1832, p. 21.
- (1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 161.
- (11)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一馬國賢在華回憶錄》，頁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12) Matteo Ripa, *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Parte Prima*, Napoli, 1832, p. 89.
- (13)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 38.
- (14) [比]高華士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頁337。
- (15)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79.
- (16)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760。
- (17)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 107.
- (18)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 107.
- (19)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 108.
- (20)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 108.
- (21) [清]郭連城：《西遊筆略》卷下，同治二年新刻本。
- (22) [清]郭連城：《西遊筆略》卷下，同治二年新刻本。
- (23)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 161.
- (24)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p. 163-164.
- (25) 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64。
- (26) 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北：光啟出版社，1999年，頁42。
- (27) [英] 羅伯特·夏克爾頓：《孟德斯鳩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32。
- (28) [法] 沙白里著，耿昇譯：《中國基督徒史》，臺北：光啟出版社，2005年，頁214。
- (29)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海：光啟出版社，2003年，頁480。
- (30)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p. 201-202.
- (31) 據 Karl Josef Rivinius, *Das Collegium Sinicum zu Neapel und seine Umwandlung in ein Orientalisches Institut*, Collectanea Serica,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4, p. 150-153,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Elenchus Alumnorum, Collegium Sacrae Familiae Neapolis*, Chang-hai, 1917,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un uomo e un'opera*, Napoli, 1976, pp. 442-460 及方豪：a 〈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載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頁379-387。
- (32) [清] 洪勳：《遊歷聞見錄》，光緒庚寅年上海仁記石印本，卷十三。
- (33) Dehergne Joseph, *La Chine centrale vers 1700*, pp. 32-71, AHSI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36, 1967.
-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502。
- (35)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200.
- (36) Gianni Criveller, *The Chinese Priests of the College for the Chinese in Naple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Indigenous Clergy (XVIII-XIX Centuries)*, 未刊稿。
- (37)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203.
- (38) Rizzolati, *Praxis Missionariorum*, chapitre V, p. 24. dans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203.
- (39) Pascal M.D'Elia, S.J.,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1300-1926*, Shang-hai T'usewei Printing Press, Sicawei, 1927, p. 43.
- (40) 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60。
- (41) Alphone Hubrecht, *La mission de Peking et les Lazaristes*, Peking, Imprimerie des Lazarites, 1939, p. 22.
- (42) 方豪：〈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載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頁390。
- (43)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56.
- (44)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un uomo e un'opera*, p. 442, Napoli, 1976.
- (45) Eugenio Menegon, "Ricerca numero uno: la via avventurosa tra Europa ed Asia di Pietro Zai (Cai Ruoxiang 蔡若祥, 1739-1806), alunno del Collegio dei Cinesi",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Napoli 2006, pp. 87-100.
- (46) Karl Josef Rivinius, *Das Collegium Sinicum zu Neapel und seine Umwandlung in ein Orientalisches Institut*, pp. 150-151, Collectanea Serica,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4.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un uomo e un'opera*, p. 444, Napoli, 1976,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un uomo e un'opera*, Napoli, 1976, p. 442. Eugenio Menegon, "Ricerca numero uno : la via avventurosa tra Europa ed Asia di Pietro Zai (Cai Ruoxiang 蔡若祥, 1739-1806), alunno del Collegio dei Cinesi", Michele Fatica,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di Napoli (1682-1869)*, Napoli 2006, pp. 87-100.
- (4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21。
- (4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357。
- (49) 《清高宗實錄》，卷1216，頁7。
- (50)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un uomo e un'opera*, Napoli, 1976, p. 444.

- (51) 生平情況據 Karl Josef Rivinius, *Das Collegium Sinicum zu Neapel und seine Umwandlung in ein Orientalisches Institut*, Collectanea Serica,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4, pp. 150-151.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204.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un uomo e un'opera*, Napoli, 1976, p. 446 及方豪：《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聯合考證得出。
- (5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502。
- (53)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un uomo e un'opera*, Napoli, 1976, p. 460.
- (54)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214.
- (55) 方豪〈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載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頁379-387，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Karl Josef Rivinius, *Das Collegium Sinicum zu Neapel und seine Umwandlung in ein Orientalisches Institut*, Collectanea Serica,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4, pp. 150-151.
- (56)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278.
- (57)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279.
- (58) Gennaro Nardi, *Cinesi a Napoli, un uomo e un'opera*, Napoli, 1976, p. 456.
- (59)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centrale vers 1700*, AHSI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36, 1967, pp. 32-71.
- (60) [清] 洪勳：《遊歷聞見錄》，光緒庚寅年上海仁記石印本，卷十三。
- (61) [美] 魏若望著，吳莉葦譯：《耶穌會士傳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263。
- (62)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130.
- (63) [法] 杜赫德編，鄭德弟、呂一民、沈堅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第三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頁151-152。
- (64) 成和德：《湖北襄陽屬教史記略》，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24年，頁177。
- (65) [清] 楊廷烈纂修：《房縣誌》(一)，頁9清同治刊本，載《中國方志從書》第329號，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
- (66) 參見(法) 榮振華、方立中、熱拉爾·穆賽、布里吉特·阿帕烏著，耿昇譯：《16-20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63、564、567，均有來自湖廣鄖陽等地區的教徒成為遣使會司鐸。
- (67) 天主教臺灣地區主教團宣聖委員會編：《中華殉道聖人傳》，頁109，臺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2000年。
- (68) 成和德：《湖北襄陽屬教史記略》，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24年，頁30。
- (69)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224.
- (70) Karl Josef Rivinius, *Das Collegium Sinicum zu Neapel und seine Umwandlung in ein Orientalisches Institut*, Collectanea Serica,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04, pp. 150-153.
- (71) [法] 樊國陰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臺北：華明書局，1977年，頁125。
- (72) 成和德：《湖北襄陽屬教史記略》，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24年，頁3。
- (73) 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64。
- (74) 方濟會士金普斯、麥克羅斯基合著，李志忠譯：《方濟會來華史(1294-1955)》，香港：香港天主教方濟各會，2000年，頁13。
- (75)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Tome 16, p. 346.
- (76)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e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leg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nese at Nap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io Prandi*, New York: John Wiley, 161 Broadway, and 13 Paternoster Row, London, 1849, p. 166.
- (77) Mgr. 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 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126.